

《一九八四》似是而非的政治态度

支运波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反极权主义小说《一九八四》中流露出了一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这种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体现在: 首先, 奥威尔作者本人充满矛盾性的性格气质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 其次, 读者对于作者所塑造的大洋国中的治理技术是松动还是加强了, 不知可否; 再次, 究竟无产者能不能创造一个无政治监控的未来世界, 奥威尔的态度也晦暗不明。这些模棱两可性, 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和强化了《一九八四》不明朗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 奥威尔; 《一九八四》; 政治立场; 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5) 06-0073-04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6.012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因创作了《一九八四》而名噪天下。它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这部奥威尔“终其一生所写就的作品”^[1], 到了书名所标定的现实时刻时, 已成功售卖了千万册, 且当年就以每天五万册的惊人速度销售^[2]。为了纪念奥威尔, 以及这部被誉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道德力量”^[3]的经典作品, 1984年甚至被命名为“奥威尔年”^[4]。这也印证了在《我为什么写作》中, 奥威尔所坚持和实践的“审美与政治”完美结合创作理念的巨大成功。然而, 这并不代表着不存在不同声音。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欧文·豪(Irving Howe)等文学评论者们, 就一直对《一九八四》的艺术性质疑不断。本文认为奥威尔所揭示和表露的政治维度也充满着重重矛盾、模棱两可与晦暗不明。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治态度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作者本人性格的矛盾性, 大洋国中治理技术的模棱两可和作家晦暗不明的政治立场。

一、奥威尔性格的矛盾性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一九八四》的巨大成就, 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 该小说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 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所叙述的尖锐政治图景与我们生存语境的切近性与逼真性。对于前者, 毋庸置疑; 对于后者, 《一九八四》出版以后在许多政党

组织以及持不同政见者那里所引起的震惊程度(包括争议性)以及对其采取的不同态度, 就已清楚明白地印证了这一点。所以, 夏志清说它虽是写未来的小说, 但其乃是“影射”现实的, “预言成分较少”^[5]。而且, 很少有作家像奥威尔那样, 强调自己是通过文学写作以表露自己政治观点的。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求文学作品与创作者现实关联证据的可靠性。

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 奥威尔说: “我认为不了解一个作家的早期发展的一些情况是无法估量他的动机的。他的题材由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些动荡不安的革命性的年代里是如此——但是在他开始写作之前, 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感情态度, 这是他以后永远也无法摆脱的”^[6]。作者的自述指明了理解《一九八四》的两条主要路径: 一是《一九八四》与作者在缅甸参加印度帝国警察部队, 在西班牙遭遇的内战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观念密不可分; 二是《一九八四》与作者的气质秉性, 以及日后形成的价值观不可分割。了解奥威尔的身世后, 我们或许会更加认同霍米·K·巴巴关于《一九八四》是作家自传性作品的看法。

这样, 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作者从个人的生活经历中获得了怎样的政治见解, 弄清楚他是一个具有何种性格的人。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版序

* 收稿日期: 2015-09-05

作者简介: 支运波(1980—), 男, 安徽怀远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言中,奥威尔一面极力申辩自己对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态度,一面又抑制不住站出来提醒人们警惕苏联政治的极权本质。对于西班牙内战,奥威尔热情歌颂革命的政治热情,却对死于革命镇压之下的大批无辜者视而不见;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诅咒大洋国满街的标语、统一的称呼和千篇一律的制服,却对曾经几乎如同大洋国现实版的巴塞罗那街头欢呼不止;他既赞成集体主义,又反对斯大林革命;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他曾跑到英国情报局举报部门举报了三十五个“共产党同路人”,并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了重大冲击。显然,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自相矛盾”者^[7]。在《奥威尔传》中,我们还了解到,他从小是个孤独而冷淡的孩子。自尊,却又难以清楚地表达自己感受。他时常经受“自我怀疑”的困扰,并且这一特点又慢慢地“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8]。关于作家本人气质对于其作品的深刻影响,雷蒙·威廉斯亦有过很好的评价。他说:“他是一个人性十足的人,但却传达了一种极端非人的恐怖:一个端庄而又有涵养的人,却表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卑琐;这些也许是这个人的一般的矛盾的成份。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却对社会主义及其信徒作一种严厉而伤人的批评。他是平等论的笃信者和阶级论的批判者,但后期的作品却深深地植根于天生的不平等及不可逃避的阶级差异等假定之中。”^[9]也就是说,威廉斯认为在奥威尔的为人与小说《一九八四》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密切关联。

此外,他非常喜欢动物,且有多年饲养动物的经历。这些动物种类也都多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可他一贯也有辱骂动物,残忍猎杀动物的癖好;他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女性的百般宠爱与悉心照料,可他却掩盖不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露出对女性的强烈歧视与十足厌恶;与他对女性的看法相关,他曾抱怨当时英国小说创作中露骨的性描写,可这并不妨碍温斯顿、裘丽娅和奥勃良之间充斥的大量性暴力与性错位幻想;自卑与羞怯埋藏于作家的内心,可他却从来也不缺少怀疑人性的冷漠与残酷无情。对此,爱泼斯坦说:“奥威尔的人格不太稳定。”^[10]这种种的矛盾性,在他后来的所有作品中都难免有或多或少的显现和流露。

二、治理技术的模棱两可

奥威尔的坎坷身世和政治经历使极权主义成为《一九八四》的主要议题。它与20世纪20年代由霍布斯、施密特以及阿伦特等人开创的极权主义政

治思想属同一思想潮流和同一议题。然而,早于阿伦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年出版的《一九八四》,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看法^[11]。众所周知,《一九八四》为奥威尔赢得世界声誉,并获得“持久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反极权主义”^[12]。即,奥威尔在其中书写了一个“毛骨悚然,使读者一面读一面感到不寒而栗”^[13]的被“老大哥”(old brother)统治的政治黑暗世界:大洋国。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恐怖,主要是因为“老大哥”实施了以电幕技术制造超级监听控制,以小说司和记录司制造“新话”和“双重思想”以涂改历史,根除记忆,以禁欲主义和暴力惩戒以消除人性这三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治理技术。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给读者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而是显示出作者对这种治理效果非常模棱两可的意见。

小说中,奥威尔认为电幕的恐怖在于它利用科技对人实施了全景式的监听。而且,由于人们对技术的本能惧怕心理加重了人们在技术环境中的无望感。小说开篇伊始,奥威尔就不厌其烦地渲染电幕监控的可怕。但电幕的恐怖实际上恐怕是被过分渲染了。因为,与其说它是统治的加强,倒不如说它是治理的松动;与其说它是极权的工具,倒不如说它自由的方式。或者说,奥威尔表现出了在这两极上极不情愿的摇摆不定。因为:第一,尽管到处安装了电幕装置,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避开电幕监控。它既有一定的监控范围,也受到光线、声音大小的限制,且不具有透视功能。第二,电幕是靠人操作的,既不能保证电幕后面随时都有人在,也不能确定监视者是否时刻在监视着。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要实现监控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电幕受监视者情绪的影响,无法保证监视者不是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和有情感的人。而且,奥威尔又特意叙述了两件有关电幕的蹊跷事情。一个是头号叛徒果儿德斯坦,被判死刑后竟然能从电幕下轻松逃脱,甚至至今仍可能藏身国内某个地方,老大哥与电幕对此竟无能为力。二是,稍有遮挡物时电幕就无法发挥作用,但它却能在一幅画的背后监视到温斯顿,而且是监视了七年后温斯顿才被捕的。这两个失败的例外(电幕监控叛徒头目失败,温斯顿避开监控失败),让读者深深地怀疑奥威尔究竟是认为电幕是一种摆设,还是以为它是一种高科技恐怖工具,或者是作为能提升人民的生命质量的积极装置呢?这颇让读者感到费解。

大洋国第二个可怕之处，奥威尔认为是通过涂改历史，消除记忆的方式以重新塑造符合“老大哥”统治的知识系统和温顺的主体。在英社党所奉行的“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信条下，通过记录司和小说司这两个政治部门删改历史，输出“新话”。记录司的修改工作并不限于报纸，“还包括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14]。暂且不论大洋国的一个记录司单靠部门几个人的手工劳动是否能完成如此浩大繁琐的工作，就是那些“内容过时而需要销毁”的一切文字（包括图像）记录恐怕也难以完成，这还不包括政治组合的变化，老大哥预言的错误等等情况出现。而且，有些天《泰晤士报》要改十几次。最后，作者写道：就连修改者自己“都弄不清了”。为了配合涂改的历史和英社党的统治需要，小说司创造并发送出去的“新话”，更是一本糊涂账。裘丽娅在小说司工作，可她却从来不使用“新话”。就连唯一一个清醒者温斯顿，也做不到随时跟踪新话。对于只有极少数核心党员可以做到使用新话的情况，请问这还有什么可怕之处，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不断渲染“新话”对人们知识和记忆的可怕之后，作者在“附录”里也不得不不断推迟“新话”实现的最后期限，而且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极富反讽意味。

“双重思想”是“新话”的产物，其实质是让人同时接受两种完全相反或矛盾的观点。这样，“老大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那些接受“双重思想”的被治理者了。因为，这是一群以“老大哥”意志作为真理的无思考能力的人格分裂者。在小说中，奥威尔不遗余力地强调“双重思想”的不思考和矛盾逻辑性对人的思想以及认知能力的严重伤害。但他所详细陈述的温斯顿在接受奥勃良“双重思想”时，却是以一个能思考和能与“双重思想”对话并批判之的具有记忆和意识主体的人出现了，这也就是他在整个小说中设置的唯一的一个清醒的人的矛盾之处。整体上说，温斯顿一直都被奥威尔置于一种凌驾于大洋国政治思想和治理技术之上，一个具有政治批判意识或与老大哥的治理技术对话能力的人的地位的。可另一方面，作者又无时无刻不对温斯顿的各种折磨和精神痛苦感同身受且又无能为力。

奥威尔在“老大哥”治理技术上的第三个模

棱两可之处体现在“老大哥”实施的极权主义治理措施是否真的消除了人性。与政治极权相比，人性在经受政治权力重压后的易碎性或许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要传达的更为深层次的意蕴。在面对政治高压和暴力惩戒时，同事友情、夫妻感情、父子亲情，乃至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理想信仰都变得异常脆弱和不堪。进一步而言，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真理和正直的追求同样会遭遇政治管治带来的生存难题。在《一九八四》中，读者看到：在大洋国，同事之间只有同志和政治话题，毫无信赖与友情可言；政治迫害了温斯顿夫妻的爱情使其走向情感背叛的道路；家庭内部内置了政治告密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都不堪一击。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由敌对、防范和危险构筑的冰冷、可怕的政治网络。可在这个严酷环境中，作者却又时不时地捅开一个个网口，让人性透过一口气来。温斯顿始终对妻子凯瑟琳都怀有一种负罪感，他与裘丽娅的婚外情也渐渐由性而生爱；派逊斯因女儿告密而被捕，不仅不怨恨女儿，奥威尔还让他感到无比“自豪”；裘丽娅对奥勃良心有所爱，温斯顿毫不掩盖自己对奥勃良的厌恶与仇恨，可奥威尔又最终让他爱上了奥勃良。人们不禁要问极权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作者到底是什么态度，这又颇让读者捉摸不透。

此外，在现代政治范围内，《一九八四》不仅传达了反极权主义思想，笔者还认为奥威尔更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一种“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治理新技术。其理由在于：一是奥威尔所书写的极权主义并未以直接行使杀戮为第一要务，而是保留这个特权为威慑以捕获大众生命进而组织生命和管理生命为首要目标；二是奥威尔并不认为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是残忍的杀害而是否认客观真相以争取被治理者的真正认同；三是大洋国中人的生命全部过程（生活、性、思想和精神）无不被政治、技术和权力逻辑所铭刻与改写，即生命是一个政治技术的文化文本。与此，奥威尔分别用公民隐私的基本权反对电幕技术，用性激情反抗极权主义，用背叛抵抗酷刑三种潜在的生命行为模式来反抗政治权力的书写，表达于政治治理广泛渗透之下的权力语境中人们生存的选择问题。以此，再返回去反观奥威尔提到的《一九八四》“真正想表达”的究竟是旨在揭示极权主义“消极”的“潜在含义”，还是“积极”的“潜在含义”，恐怕作者本人也没有拿定主意^[15]。

三、晦暗不明的政治立场

大洋国政治部门受管制的乏味而“中性的”生活,不是温斯顿要的生活;为英社党“尽生育义务”的夫妻生活以及不安定的婚外偷情生活,也不是温斯顿要的生活;家长随时防范子女告密的生活,同样不是温斯顿向往的生活。因为,在温斯顿看来,这些都是“简单枯燥、黯淡无光、兴致索然”^{[14]66}不值得过的生活。他要挣脱英社党试图“树立的……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14]67}的某种“形式生命”(form of life)的“活死人”一样的政治生活。温斯顿渴望着过一种充满歌唱、友爱、自由恋爱、畅所欲言的有情感、有人性、无政治权力的无产者的平等生活。这也就是奥威尔不断在小说中站出来表态:打破大洋国极权政治坚冰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的原因所在。但话说回来,奥威尔反对老大哥无人性的极权统治的政治生活倒值得肯定。可他寄希望于无产者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无产者们的感性的、享乐的经验主义生活观,则让人感觉似乎有些格调不高。

奥威尔把“希望”赋予无产者的理由在于占人口 85% 以上的无产者没有受到“老大哥”的政治污染。在无产者居住区,没有安置电幕、窃听器、巡逻机等监听装置,也没有思想警察,男女可以自由恋爱、随意闲谈,可以歌唱、化妆,没有禁欲主义,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强壮的身体,可以健康快乐地依据天性过一种自然的快活生活。奥威尔寄希望于他们,赞叹“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理想,他们……有人性……有原始的感情”,所以能“爆发出生命来”^{[14]149}拯救那些受政治书写的“政治生命”者们去过一种属于自我的,保持人性的、有“情感的生命”(affect life)生活。《一九八四》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简短的充满舒缓语调的优美段落,都是温斯顿对这种无产者人人平等社会的浪漫想象。

可是,反过来,奥威尔又对无产者心存疑虑。在奥威尔看来,无产者不关心政治和战争,他们又“没有智力”和对社会的理解力,无生活目标,这显然极容易被政治鼓动和利用,迸发出盲目的集体主义狂热,沦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在极权主义统治内部,并没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意识

到自己的力量”^{[14]63}。如果改朝换代的话,他们也只是再度进入只是“改了统治者的名字”的政治时代。况且,人从来都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即使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福柯仍坚持认为,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存在方式仍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奥威尔开列的社会前景更像是一种文人的乌托邦畅想。对于这种不确定和不真实性,奥威尔也说:如果有这一天的话,“可能要等一千年”。这比作者对大洋国实施新话的不确定(到 2050 年)期限,足足推迟了 900 多年。

四、结语

英社党在城市安排电幕监控,在农村却没有,而他又告诉统治者广大农村才是危险的政治空间。治理多一点的地方是安全的,而治理少的地方反而容易爆发反抗。他一会儿说自己的作品在 1936 年后都涉及反极权主义,一会儿又在《政治与英语》中表露出露骨的语言极权主义态度;众人皆知,他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可他却秘密地透露自己在西班牙时“更认同 P. O. U. 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政策”^[16]。正是他的这种晦暗不明的政治观点,使《一九八四》到底是对苏联极权主义的讽刺,还是反共小说,抑或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着实让不少政治界和文学评界人士伤透了脑筋。事实上,终其一生,奥威尔身上都矛盾重重。他对政治、暴力以及社会主义显露出明显的矛盾心态,这使得他一度被视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矛盾的英国作家”^[17]。至今,他依然让人琢磨不透。这或许也是《一九八四》充满阐释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 [1] Martha C Carpentier. The “Dark Power of Destiny” in George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J].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014, 47 (1): 179-194.
- [2] Hugh Willmott. Strength is ignorance-slavery is freedom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3, 30: 515-552.
- [3] Dennis Poupar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6) [M].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5: 339.
- [4] Pramode Verma. George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twenty-five years lat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2009, 2: 71-72.
- [5] 夏志清. 夏志清文学评论集 [M]. 台北: 联合文学杂志社, 1987: 37.
- [6] (英)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文集 [M]. 董乐山,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259.

【下转第 81 页】

【上接第 76 页】

- [7] 押沙龙, 周有光.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 [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 199.
- [8] (美) 杰弗里·迈耶斯. 奥威尔传 [M]. 孙仲旭,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7, 18.
- [9] (英)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M]. 吴松江, 张文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63.
- [10] (美) 理查德·A 爱泼斯坦. 文学作品能起到社会科学的功效吗?——以乔治奥威尔为例 [M] // (美) 格里森.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71.
- [11] David Dwan. Truth and freedom in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J]. 2010, 34 (2): 381-393.
- [12] Stephen Ingl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eorge Orwell: a reassessment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15.
- [13] (英) 伯特兰·罗素. 罗素回忆录: 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M]. 吴凯琳, 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6: 170.
- [14] (英)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 [M]. 董乐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37.
- [15] George Orwell.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M]. New York: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1968: 88, 468.
- [16] (苏) 布卢姆·阿伦·维克托洛维奇. 奥威尔在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遭遇以及一封鲜为人知的奥威尔致苏联的信 [M] // 林贤治, 筱敏. 人文随笔·2006·春之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141.
- [17] Richard J Voorhees. The paradox of George Orwell [M]. Indiana Poli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The Paradox of *Nineteen Eight-Four* in Political Attitudes

Zhi Yunbo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has shown some degrees of equivocal and specious political attitude in *Nineteen Eight-Four* written by Orwell, which was famous for anti totalitarianism. This paradox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author has a contradictoriness character influencing his political stand; Secondly, Reader could not make sure whether the political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Oceania has been strengthened; Finally, Orwell expresses a indeterminacy stand toward whether the proletarian can create a future without political control. This three uncertainties contributes to and strengthens partly the controversial view over *Nineteen Eight-Four*.

Key words: Orwell; *Nineteen Eight-Four*; political stand; paradox

(责任编辑: 朱世龙)